



返樸歸真

——黎廷瑤

1973年《中大學生報》總編輯

自從中文法定運動開始，大學學生會便成為香港學生運動的中流砥柱。除了帶動校內同學外，更帶動社會上一定數量的群眾投入各個社會運動，而中大當年一切學生會的活動都染上了「認識中國，關心社會」的色彩。此一時期，學生會的革命氣息很重。無論對學校、對社會、對國家，學生會都成為一個敢於站起來，敢於爭取，敢於鬥爭的組織。¹1973年的《中大學生報》繼承了以往四年《中大學生報》的精神，以「建設中大、改革香港、胸懷祖國、放眼世界」作為編輯方針。²黎廷瑤正是當年學生報的總編輯。

那天記者帶了從崇基圖書館借來的當年《中大學生報》合訂本（1972-1973），請黎廷瑤憶述那個火紅年代的歷史。

迷上了政治思潮

提到當年的學生報，黎廷瑤劈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當年《中大學生報》的最大特色便是脫離群眾。」他認為，當年一

群思想激進的學生，壟斷了學生會和學生報，自行其是，與群眾脫節。「這群同學沉醉於探討較高層次的思想問題；但同時，大多數的同學都是由普通的中學生升上大學讀書，中學並沒有政治討論的氣氛，也沒有激進的文化，自然與那些激進的學生格格不入」。

或許有些人會認為，那個時代的學生縱使是過於激進，但他們那股追尋理想的熱情，對社會、對國家的使命感，仍是教人感動的。可是黎廷瑤卻以過來人的身份，從批判的角度看當年的學運。「他們不過是一群走向極端的學生，『迷上』了政治思潮，其實那只是一種神話，帶着宗教情操。他們賦予自己很大的使命，但到1976年四人幫倒台，神話便破滅了。當然，從正面看，他們是一群對社會、對國家有承擔的學生，但思考不夠理性，未能客觀地探討問題。也許當時的情況，不容許你理性地思考。然而，今天我回頭再看這些學生報，發現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：例如對中

國、對民族主義及對共產政權的盲目附和。六十年代，學生對共產政權是極不接受的，中國對我們來說是個很神秘、很可怕的地方；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，卻走向另一個極端，學生覺得革命很偉大，從前誤解了中國——這其實同樣是不理性的」。

「我做學生報那段時間，革命的熱潮只是剛剛開始，同學還未毫無保留地迷戀那種革命思潮，而是在中間徘徊，仍然保留1969-1972年開始浮現的知識分子探討問題的態度，但到了1974-1975年這種態度已蕩然無存，一面倒的盲目支持中共。四人幫倒台後，那班激進的同學思想上便完全崩潰，失落很大。這只是幾年間的事，但學生的思潮動盪卻很大」。黎廷瑤回憶那段日子，不免唏噓。

不同思潮匯聚學生報

雖然當年搞學生會、學生報的學生都走向極端，但學生報卻能容納不同的激進思想。「這可說是當年學生報的第

二個特色。不同的派別，如社會派、國粹派、托派的文章，都會在學生報中出現，但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比較激進、政治化和脫離群眾，試想想有多少學生會對這些文章有興趣？」

黎廷瑤繼續說：「學生報第三個特色，是較多深奧的思想性問題的探討，你可以說我們『扮』深奧，也可理解為一種病態。當年的同學覺得要學習往昔偉大的思想家、文學家，把他們當作偶像，寫文章也要模仿他們，要探討人生的問題，這些文章都匯聚在學生報上。姑勿論這些同學是否真的有這種水平，但至少他們肯去嘗試。但客觀的情況是，學生報變得過份艱澀，對社會問題也不進行理性的探討，當中毛病頗多。但總的來說，我們當時是很有心、很有誠意去做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」

黎廷瑤依然十分懷念那段辦學生報的日子。那時候，他們每天躲在印刷廠，在印刷廠的時間比在大學的時間還要長。

「其實現在的工作與當時的差不多，當年一個月出版一份報紙，現在每天都要出版數十頁報紙，但性質是一樣的；當然現在科技進步多了」。

黎廷瑤還透露了當年的一些趣事：「以前改稿要將那段文字切出來，換上另一段文字。碰巧字條給風吹散了，便得重新將一堆字紙砌回一篇文章，那都是很深刻的回憶。」

「當時我們很花心思去辦這份學生報，例如『紫金亭畔』這一版，讓不同的散文匯聚在這裡」。黎廷瑤指著學生報上的其中一頁說：「因為紫金代表中大，亭是因為中大有個瀛亭，『紫金亭畔』的意思是在中大的亭旁邊，大家一起聊天，寫一些零碎但具校園氣息、具思想性的散文。」

鍾情出版界

社會學系畢業的黎廷瑤，前後在出版界打滾了二十三個年頭。他說，投身

出版界的興趣源於做學生報的經歷，所以他在出版界做得很投入、很開心。但他畢業後卻不是立即進出版界，而是當了四年社工。「做社工只是想得到一些體驗，我想做四年已經足夠了。我還是比較喜歡出版，於是轉向media發展」。1979年黎廷瑤加入《七十年代》月刊，三年後轉到《信報》。從雜誌轉到報紙，一做便是六年多。「當年碰上中英談判，經常去北京採訪，香港的局勢也風起雲湧，自己經歷過這段重要的歷史，雖然很辛苦，獲益卻不少」。

到了1988年，黎廷瑤轉到《亞洲週刊》當助理主編，他說，第一年還算平靜，後來碰上八九民運，便很「熱鬧」。「那時涉獵很多中國、台灣、香港的事件，增加了對台灣的認識，也看到台灣的轉變」。

兩年後，再次轉職，加入了黎智英創辦的《壹週刊》，一做九年。「這是另一種經驗，《壹週刊》是完全市場導向的刊物，作風與內容引起過不少議論」。

九年後，他又想再轉職。「我想報紙相對雜誌來說，始終是主流的傳媒。碰巧當時《星島》改組，便加入了《星島》。當初進《星島》工作也很吃力，要把一份沈寂多時的報紙重新推回上升軌道，比搞一份新報紙更難、更艱辛」。

「現在總算有點成績，在中產階級讀者群中建立了地位，並擺脫了過往人們對我們的成見。我在這裡工作很開心，因為《星島》是比較客觀、平實的報紙。現在的傳媒有很多歪風：誇大、煽情，有時甚至歪曲事實。經歷這麼多年，我想返樸歸真，踏實一點去做傳媒，不想太過譁眾取寵，我想這不是做傳媒該有的態度」。

「其實報紙為了保持銷量，也需要商業元素，但在過程中要不斷反省有否違背新聞原則。這兩種元素可以是沒有矛盾的。」

黎廷瑤（75新亞社會）現職《星島日報》執行總編輯。1973年《中大學生報》總編輯，畢業後任職社工，四年後轉投出版業，至今已逾二十年。曾任職《七十年代》月刊、《信報》、《亞洲周刊》、《壹週刊》等。



讀社會系畢生受用

讀社會系對從事傳媒工作，到底有沒有幫助呢？「具體的理論我未必記得，但由於修讀社會學而訓練出來的分析頭腦，卻是終生受用的」。他表示，金耀基教授和黃宏發教授都是他印象深刻的老師。

「讀社會系的人不會太激進，因為社會學訓練我們客觀地分析問題，以局外人的角度看事件，不會當局者迷。反而讀醫科、理科、文科的人在政治思想上較容易走向極端；文科的人偏重感情，理科的人面對真實社會人生的問題時，較容易出現宗教性的情操。所以，修讀社會學，對投身傳媒幫助甚大；因為傳媒工作需要理性地看社會問題，不可以太 emotional。」■

註釋

1. 雷競璇：《對當前問題的考慮》，《中大學生報》，1973年第5卷第1期。
2. 《社論》，同上註。
3. 丹鳳：《認清時勢，認真讀書》，《崇基學生報》，1971年11月12日，第12版。
吳瑞卿：《從認識中國到檢討自我》，《崇基學生報》，1973年6月12日。